

# 走出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研究的误区

韩国良

(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河南南阳 473061)

**摘要:** 孔子“删诗”为司马迁所首倡, 然而自唐代开始就不断有人提出怀疑。但由一系列考证可以推知: 孔子确曾有“删诗”之举。前人提出的三点理由, 都不能成立。据钱穆考证, 鲁昭公二十年(前522), 孔子三十岁, 始授徒设教。若此论不差, 则《诗经》的固定成书并具有权威当正是在这一时期。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并没有错, 乃是后人误读了《史记》。

**关键词:** 司马迁; 孔子; 《诗经》; 删诗

**中图分类号:** I7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7)01-0017-07

孔子与《诗经》的关系如何,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正因如此, 所以千百年来才有无数学者为之争论不已。我们姑且不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目前究竟有多大现实意义, 单是一种学术现象, 我们就应给它一个明切的解释。特别是在先秦学术研究方面, 这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基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本文拟着重探讨以下四个问题: 孔子是否真的删过《诗》? 孔子“删诗”最有可能是在什么时期? 《诗经》的固定成书与孔子的授徒设教二者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究竟是司马迁误读了《论语》还是后人误读了《史记》?

## 一

孔子“删诗”之说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 及至孔子, 去其重, 取可施于礼仪, 上采契、后稷, 中述殷、周之盛, 至幽、厉之缺, 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 《鹿鸣》为《小雅》始, 《文王》为《大雅》始, 《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 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以备王道, 成六艺。<sup>[1]</sup>

但是这一说法, 早在唐代就有孔颖达等提出异议, 以后又有很多学者也表示怀疑。怀疑的结果是直到今天我们也仅只承认: “孔子对‘诗’作过‘正乐’的工作, 但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 则是不可信的”。<sup>[2]</sup>

根据孔颖达等的质疑, 前人否定孔子“删诗”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对此日人冈村繁《周汉文学史考》讲的很明白: 其一, 《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较早的古代典籍中, 被引用到的《诗经》篇名或章句大都见于现存三〇五篇中; 相反, 被引及的亡佚诗章不到十分之一。因此很难认为孔子曾经把原来的三千余篇诗歌删减到三〇五篇。其二,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前五四四)记载, 该年吴国公子季札访问鲁国要求观“周乐”, 其时鲁国乐工为季札依次演奏了《周

收稿日期: 2006-11-05

作者简介: 韩国良(1964-), 河南新野人,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化及文学

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以及《邶》等国风，又有“小雅”、“大雅”、“颂”等宫廷歌曲。如果认为该记载可信的话，那么从演奏诗歌的顺序推知，除了“国风”部分稍有出入外，在孔子之以前已经有现存《诗经》的原形。其三，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中云：“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又同书的《阳货》篇中有“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这说明孔子对淫乱的郑国之音是十分厌恶而极力贬斥的。但是在《诗经》中“郑风”却作为“国风”之一而编入，并且在十五国风中其数量特多，达二十一篇。<sup>[3](P2)</sup>

前人所以否定孔子有“删诗”之举，正是以上述理由为根据的。初看起来以上各条理由都很有说服力，但实际上都是很难站住脚的。

## 二

我们先看第一条。（一）由司马迁的论述不难看出，由三千到三百显然经过两道工序：一是去重，二是删取。“古者诗三千余篇”，也应包括重复的在内。这种重复现象在当时十分普遍，这可由《战国策》、《荀子》二书得到充分的展示。西汉刘向《战国策书录》云：“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脩书》，‘错乱相糅’，‘除复重，得三十三篇’。<sup>[4]</sup>那么，不去“复重”，将各版本的篇目累加起来，恐怕是要远远大于这个数的。《荀子》的情况与此类似。袁长江云：“刘向编订《荀子》一书，当时社会上散乱的荀卿的文章有三百多篇，实际上多是重复的。经过刘向整理，去掉重复篇章，得三十二篇。司马迁的‘去其重’也是指这种情况。”<sup>[5]</sup>《诗经》原来有三千多篇，但是现在我们能见到的也仅止三百零五篇。这也就是说二者都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所以袁长江认为《荀子》与《诗经》的情况可以类推。不过在实际上《荀子》与《诗经》的情况并不完全类似，《荀子》的三十二篇只是“去重”所得，而《诗经》的三百零五篇则是“去重”以后，又经删取（也即筛选）才得到的。袁先生的论述显然不准确。不过有一点我们仍可肯定，袁先生的论述尽管不周延，但他的论述对我们正确理解司马迁“古者诗三千余篇”的记载仍是非常有启发的。前人以“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为据，否定《史记》的记载，殊不知“十分去九”也应包括“去重”者在内。如果参考《战国策》及《荀子》的情况，并把“去重”与删取都考虑进去，那么“十分去九”云云，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赋《诗》引《诗》在先秦十分普遍，但“逸诗”的多少并不能按《论语》、《孟子》等书计算。因为此时《诗三百》已经成书，人们的赋引自会以此为参照。《左传》、《国语》虽然成书也较晚，但由于它们所记多为孔子以前的事，因此依据它们得出的结果自应是更为可信的。冈村繁曾对《左传》一书的赋引情况作过详细统计，由他的列表可以看出《左传》对诗的赋引共计190首次，其中“逸诗”10，《秦风》1，《唐风》、《豳风》各2，《郑风》9，二《南》11，三《卫》14，三《颂》18，二《雅》123。若去其复重，则实际赋引114首，其中“逸诗”10，《秦风》1，《唐风》、《豳风》各2，《郑风》、二《南》各8，三《卫》13，三《颂》12，二《雅》58。<sup>[3](P16)</sup>与前人所说“被引及的亡佚诗章不到（现存《诗经》的）十分之一”的结论可谓正相一致（10:104）。但是需要注意《秦风》、《郑风》皆秦、郑人所赋，二者显然属于特例，这也就是说秦、郑之诗在当时的政治交往中地位并不高，当时人对“诗”的赋引，范围是十分有限的。豳乃周王室的发祥地，二南乃周公、召公的分陕之地，卫乃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受封之地，唐乃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受封之地，《雅》、《颂》乃周王朝的朝廷用诗。《左传》对“诗”的赋引所以如此集中，这显然是可

以理解的。如果以上所论不差,那么,先秦时期的所谓“逸诗”显然只应属于以上少数地区。试想其它广大地区的诗作连在人们的交往中被赋引的机会都没有,这些“逸诗”又怎么会是它们的遗留呢?由于上述少数地区政治上的显贵地位,依理而论它们的诗歌散佚也应该是较少的。可见以“被引及的亡佚诗章不到(现存三〇五篇的)十分之一”为据,来证明司马迁乃属主观臆断,这一论证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国语》的情况与《左传》也基本一致。

(三)《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方玉润《诗经原始》卷首下《诗旨》:“夫子反鲁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丁巳,时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诗,当在此时。乃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有‘三千’说耶?此盖史迁误读‘正乐’为‘删诗’云耳。”<sup>[7]</sup>按,由《史记》所载不难看出,司马迁把“删诗”与“正乐”分的是非常清楚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以下讲的是“删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下讲的是“正乐”。“删诗”在前,“正乐”在后。“误读”云云显然也是缺乏根据的。不是司马迁氏误读了《论语》,实乃方玉润等误读了《史记》。

(四)即使对“三千”之说不能苟同,也不应把“删诗”之说一并否定。《吕氏春秋·察传》载古人“己亥”讹为“三豕”,“三千余首”或为“已千余首”之误也未可知。“三千”之说与“删诗”之说原属二事,前人对《史记》“删诗”之说的否定显然太过草率。古诗是否已达“三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经》是否真的为孔子所定。即是所删只百首之多,那它与“三千”之说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也是同样巨大的。

### 三

下面再看第二条。《诗》三百在孔子以前并未成书,孔子以前人们并无《诗》的认识。对这一点,我们也是同样不难证明的。(一)春秋之时赋诗引诗的风气已十分流行了,而《诗》三百的篇目仍不完备。如《硕人》、《载驰》、《清人》、《黄鸟》四诗产生的时间就是很晚的。请看《左传》的四条记载: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sup>[6](P1724)</sup>

(狄人)灭卫。……卫之遗民……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sup>[6](P1788)</sup>

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sup>[6](P1788)</sup>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sup>[6](P1844)</sup>

《左传》始于隐公元年(前722),以上四事中间两则发生在闵公二年(前660),首尾两事分别发生在隐公三年(前720)、文公六年(前621),而春秋引诗之事早在桓公六年(前706)就已存在了。桓公六年载郑太子拒婚云:

公之未婚于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人问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sup>[6](P1750)</sup>

此事上距《硕人》只有14年,而比《载驰》、《清人》早出46年,比《黄鸟》早出85年。由《左传》所载材料看,《硕人》以前虽没引、赋诗的现象,但《载驰》、《清人》前已有3次,《黄鸟》前已有21次,<sup>[3](P16)</sup>这之间还不包括“君子曰”之类的引诗。因为“君子曰”中的“君子”固然可指当时之君子,但也可能指后世君子对前事的评论,所以这里不足为据。由此足见,“《诗》三百”的观念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是绝不会出现的。

不唯如此，据近现代学者考证，《诗经》之诗还有比《黄鸟》更晚的，如《陈风·株林》作于宣公九年（前 600），《邶风·击鼓》作于宣十二年（前 597），《曹风·下泉》更晚至昭公三十二年（前 510），<sup>[8]</sup>再过 35 年至哀二十年（前 475），历史即进入战国时代。由此愈可看出，春秋时期人们所赋引之“诗”绝非后世之“《诗》三百”，这一点确实毫无疑义。

（二）《诗经》的固定成书并具有权威是在孔子时代才出现的。《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sup>[6](P2525)</sup>《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sup>[6](P2507)</sup>《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sup>[6](P2461)</sup>《颜渊》：“（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sup>[6](P2502)</sup>由以上所载不难看出：“《诗》三百”在孔子时代确已成书。它篇篇合礼，无一不善，已经被俨然视为神圣的教科书了。孔子讲“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由此出发，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又，《左传》襄二十九年（前 544）载“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云：

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sup>[6](P2006)</sup>

由这则材料不难看出：当时的诗歌并非全善。由“其细已甚，民弗堪也”、“国无主，其能久乎”这些论述不难推断当时人对诗歌的优劣评判。歌诗的风气依然存在，它的目的还是“观兴衰”，在当时人的心中仍然保留着采诗“观风”的观念。季札通过“观乐”看到了郑、陈二国的败征，而二国当时均未消灭<sup>①</sup>，由此可见：当时所歌之诗必是新近所采，古代采诗之风直到此时也仍未完全消歇。很难想象：季札会通过很久以前的诗作来判断郑、陈当前的兴衰。既然采诗之风仍未绝迹，则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诗歌的采集整理仍在继续。更明确一点说，也就是诗歌的篇目仍处于流动状态。或许季札来聘时已经有一个诗歌传本，但当时人绝不可能把它当专著看待。上文说《下泉》产生于前 510 年，比季札观乐（前 544）又晚出三十四年，这也同样说明当时的诗歌篇目仍在继续变动着。据《左传》记载，季札此次所赏之诗除郑、陈、齐三国外，还包括“雅”、“颂”及其它十二“国风”，由此以断，季札所赏必是从“雅”、“颂”及十五“国风”分别挑出若干篇子——他是没有工夫把当时所采集的诗歌全部欣赏一遍的。既是如此，则不难断定当时的诗歌评价仍带有较大的偶然性、随意性，人们还没有对这些诗歌作系统研究，产生专著的条件到此时为止仍不成熟。关于“雅”、“颂”和十五“国风”的分类，当时应该已经齐备，所不同的是这些分类仅仅展示的是诗歌的来源，它们并未成为诗歌总集之下各个分集的专名。《左传》把它们当作专名看待（姑且这样认识），这只能视为《左传》的作者因受后世《诗经》成书的影响而对当时之事所作的追叙。季札观乐于鲁而称“周乐”，可见当时的诗歌采集工作仍是由中央负责的。尽管这种采集活动可能已很不正常，但由地方到中央、再由中央到地方这种诗歌流通渠道应该说还是部分存在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我们判断孔子是否删《诗》，起决定作用的乃是诗歌的篇数。季札“观乐”既然并未涉及诗歌的篇数——三百余篇？三千余篇？则以“‘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所歌之‘风’，无在今十五国外者”，<sup>[9]</sup>来说明孔子并未删《诗》，这一推断也同样不足为凭的。孔子生于襄二十二年（前 551），<sup>[10]</sup>季札来聘

<sup>①</sup> 据陈梦家先生考证，郑国亡于前 375 年，陈国亡于前 478 年。详见陈氏所著《尚书通论》（外二种）第 461 页的《两周诸侯存亡表》，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版。

时已经八岁。孔子八岁时《诗经》仍未成书，足见《诗经》的固定成书确实很晚。认为季札来聘时已有《诗经》的原型，也同样是缺乏足够的依据的。(三) 尽管《左传》中所载人物不断引诗，但他们的引诗与后世的引《诗》在情感态度上是大大不相同的。后世的引《诗》源于他们对《诗》的崇拜，《左传》的引诗(“君子曰”之类的引诗除外)则缺乏这种经典情结。因为《左传》所引，除诗之外，也包括各种风谣、箴语，如僖五年(前655)：“(卜偃)对曰：‘童谣云：“丙之辰……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sup>[6](P1795)</sup>宣十二年(前597)：“栾武子曰：‘……箴之言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sup>[6](P1880)</sup>襄二十七年(前546)：“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sup>[6](P1995)</sup>昭公三年(前539)：“(晏子)曰：‘谚：“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sup>[6](P2031)</sup>等等，可谓都是十分典型的例子。我们不能因为它们作了论据，就认为它们也是某种典籍的名字。《左传》所载之“诗曰”、“诗云”，与《论语》、《孟子》中的“《诗》曰”、“《诗》云”，在涵义上是并不相同的。后者指的是一部典籍，前者则指的是一种具体的诗文形式，在论证力上它们与风谣、箴语应该说是大致相当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朱自清云：

清人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一云：“风诗之变，多春秋间人所作……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欤？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之诗，此人可赅为自作。其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论当时作诗和赋诗的情形，可谓是十分确切的。<sup>[11]</sup>

有鉴于此，说《左传》中的“诗曰”、“诗云”乃指一种文体，也就更无疑义了。

孔子八岁时《诗经》尚未成书，孔子以前又从无人提及“《诗》三百”，而孔子在授徒过程中却不断给《诗经》以很高的评价，由此以断，司马迁的论述我们显然没有理由反对。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离孔子比较近，他所见到的材料肯定比我们多。我们说司马迁的论述在现存文献里找不到足够的论据，那么我们对司马迁的否定又有什么充分的根据呢？如果事事都依这种态度，历史上需要重新考订的事情就太多了。有人怀疑历史上有没有屈原存在，显然也犯的是同样的错误。

#### 四

最后来看第三条。(一)《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对于这句话，历来主要有两种解释：邢昺云：“曰‘思无邪’者，《诗》之为体，论功诵德，止僻防邪，大抵归于正。故此一句可以当之也。”<sup>[6](P5)</sup>朱熹云：“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情性之正而已。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其义。”<sup>[12]</sup>显然，在邢昺看来，“思无邪”乃是孔子对《诗经》的思想所作的整体评价，“《诗》三百”篇篇珠玑，无一不善，而朱熹认为“思无邪”乃是就《诗经》的功用言，“《诗》三百”并非篇篇雅正，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只能拿来作反面教材的。

然《论语·颜渊》载孔子之言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若依朱说，《诗经》之诗有好有坏，善恶兼存，则这显然与孔子“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的理论相矛盾。由“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的原则我们不难得知：“《诗》三百”在孔子心中必是篇篇皆善的。孔子把“《诗》三百”作为他学生的教科书，反复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使于四方”，“不学《诗》，无以言”，<sup>[6](P2522)</sup>很难想象他会把一些不健康的“黄色”诗作，呈献给学生作反面教材。朱熹之言显然是有违常理的。又，《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sup>[6](P2487)</sup>把《诗》、礼、乐三者并列平举，由此以断，也足可证明孔

子是绝对把《诗经》作经典看的。

那么，同样一部《诗经》，朱熹怎么会产生如此悬殊的认识呢？我想，其中的缘由不外两点。其一，解《诗》方法不同。春秋称诗及汉人解《诗》大多都是断章附会，孔子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如《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余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sup>[6](P2466)</sup>诗歌明明讲的是女性之美，而孔子师徒却把它与“仁”、“礼”的先后关系联系起来。以这样的方法来诠释“《诗》三百”，那“《诗》三百”自然是篇篇“无邪”的。尽管朱熹“舍传求经”的解《诗》方法，较之古人显得更为高明，但是我们这里并不是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其二，思想境界不同。孔子的儿子死后，孔子劝儿媳改嫁，这一点是史有明文的。可是这在朱老夫子眼里显然是“失节事大”。朱熹所以把《诗经》中的不少作品都看作有伤风化的反面教材，据此显然是不难理解的。

(二) 孔子一生对“郑声”确实十分反感。《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sup>[6](P2525)</sup>《卫灵公》：“子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sup>[6](P2517)</sup>对此显示的可谓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郑声”与《诗经》的《郑风》应当是两个概念，我们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譬如李白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五十九首》）可是他对建安以后的诗歌并不是全盘否定的。其《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诗云：“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常忆谢玄晖。”《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对谢朓的诗文表现得如此敬重，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也就是说孔子厌恶“郑声”是从整体而言，此并不意味着孔子对全部“郑诗”都是否定的。孔子既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则显而易见选入《诗经》的“郑诗”在孔子眼里也必是全善的。

(三) 《左传》对“诗”的赋引，除政治上少数几个显贵地区外，只有《郑风》、《秦风》是个例外。尽管二“风”皆为本国人所赋，但这也仍能够从侧面说明二国的诗歌创作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郑风》在《左传》之中被赋竟达八首之多，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孔子讲“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声”的传播竟然危机到“雅乐”的生存，这更可以从反面说明“郑声”在当时是多么流行的。尽管这里的“郑声”并不见得都是郑国所产，但对这类乐歌以“郑”命名，这也可间接说明郑国的诗歌创作十分发达且极有影响。上文冈村繁先生说：“孔子对淫乱的郑国之音是十分厌恶而极力贬斥的。但是在《诗经》中‘郑风’却……在十五国风其数量特多，达二十一篇。”其实这一现象并不难理解。在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十五国风”中，郑诗的数量所以“特多”（位居第一），这与郑国的诗歌创作比较繁荣，也即郑诗的基数较大显然是密切相关的。例如邠是周王朝的发祥之地，可是“邠风”在《诗经》中却只有7首之多，这显然是“邠诗”本来就少，并不是不为人重视造成的。既然如此，则不难得知以孔子厌恶“郑声”，而《诗经》所录又以“郑诗”最多为据，来否定孔子“删诗”之举，这一论断也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 五

由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在前人对司马迁的三条质疑中，最为有力的是其中第二条，第二条如果不能成立，那一、三两条就都不攻自破了。孔子八岁时《诗经》尚未成书，司马迁所见到的材料又比我们多，我们既然拿不出像样的材料证明他所载有误，而现在能够证明孔子曾经“删诗”的材料又这么多，综合这些材料与司马迁的记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孔子“删诗”之说直到目前为止也仍是言之成理，不可动摇的。

孔子“删诗”之说不可动摇，那么孔子“删诗”最有可能是是在什么时期呢？据钱穆考证，鲁

昭公二十年(前522),孔子三十岁,始授徒设教。若此论不差,则《诗经》的固定成书并具有权威,必是在孔子中年之后。由于孔子对所删之《诗》的特别强调,“《诗》三百”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才得以确立。有鉴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自从“《诗》三百”被删定那一刻起,它就注定要与儒家文化一起来一同刷写新的中国历史了。

####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963.
- [2]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61.
- [3] [日]冈村繁(陆晓光译). 周汉文学史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4] 刘向(高诱注). 战国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8.
- [5] 袁长江. 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9. 74.
- [6] 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7] 方玉润. 诗经原始[M]. 上海: 泰东书局, 1924. 10.
- [8] 陆侃如, 冯沅君. 中国诗史[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6. 54-60.
- [9] 崔述. 崔东壁遗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309.
- [10] 钱穆. 孔子传[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107.
- [11] 朱自清. 诗言志辨[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8.
- [12]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7. 7.

## On Sima Qian's Argument that Kong Qiu Selected *the Book of Songs*

HAN Guoliang

(Nanyang Normal College, Nanyang, China 473061)

**Abstract:** The idea that Kong Qiu deleted poems was initiated by Sima Qian. This opinion has been doubted by quite a few people since Tang Dynasty, but it is still concluded from a series of textual criticism that some poems in *the Book of Songs* were deleted by Kong Qiu from the numerous poems which had been composed already in his time. The three accounts by forefathers who denied Sima Qian's argument do not hold water. Some scholars thought that Kong Qiu began to recruit and teach disciples when he was thirty years old. If the version is credible, it must be in those days that *the Book of Songs* became a definite and authoritative anthology. It is not true that Sima Qian misread LUN Yu, and the fact is that futurities misread Shi Ji.

**Key words:** Sima Qian; Kong Qiu; *The Book of Songs*; Abridgment

(编辑: 陈增杰)